

范文澜与古籍整理出版

齐浣心



范文澜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曾担任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第一任所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学部委员，1958年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范文澜在古籍整理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整理“二十四史”

“二十四史”是中国古代二十四部纪传体史书的统称。20世纪50年代开始，中华书局开始整理出版“前四史”，随后将其余二十史全部进行标点、断句，历时20余年，最终完成“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为学界提供了一套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理本。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成为海内外公认的现代标准本，享有“国史”标准本的美誉，这是中华书局为史学界作出的巨大贡献。每每说起中华书局版“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经过，都要从毛泽东倡议，范文澜、吴晗组织进行整理说起。

1958年7月，毛泽东主席指示吴晗、范文澜组织标点“前四史”工作。二人接到组织整理“二十四史”的任务后，于1958年9月13日下午，召开了一个小规模的工作会议。蔡美彪在《“二十四史”标点缘起存件》一文中对这次会议记载：“范文澜时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会议在该所会议室举行。”这次会议的与会人员也许自己都没有想到，正是这次整理点校“二十四史”工作召开的首次会议，开启了标点、整理“二十四史”二十余年的漫漫长途，而他们所做的工作，也在《中国学术史》出版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这次会议的重要性，在于确定了点校“前四史”的具体方案，并对其“二十史”及《清史稿》的标点工作也进行了研究。会议最终决定由中华书局制订规划方案，着手组织人力开展工作。

同年10月6日，吴晗、范文澜专门致信毛泽东主席汇报工作情况，他们在信中说：“关于标点前四史工作，已遵示得同各方面有关同志讨论并布置，决定于明年10月前出书，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其余二十一史及杨守敬历史地图改绘工作，也作了安排(标点本为便于阅读，拟出一种平装薄本)。现将会议记录送上，妥否，乞指示。”不久，毛泽东复信：“范、吴同志：来信收到，计划很好，望照此实行。”

此后，“二十四史”的整理出版工作，在学术界、出版界的配合下，

逐步推进，历尽坎坷，历时20余年，先后有近200人参与其中，终于在20世纪70年代完成标点、整理工作，为世人提供了一套新中国规模最大的、影响最为深远、系统完整科学规范的现代整理本，这部“二十四史”，成为海内外通行的现代标准本。

编著《中国通史简编》

1940年，范文澜初到延安，被任命为中央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主任。当时延安的干部群众急需提高文化水平，但缺少适用的教材，为解决这个问题，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接到毛泽东关于编写一本简明扼要的中国通史的指导。范文澜作为研究室主任，与同事谢华、佟冬、叶蟠生、尹达、金灿然、唐国庆等进行分工，每人负责一部分，由范文澜总其成。一本书由多人合作，成书难度必然很大，例如对体例的把握、文字风格的统一等等，几乎每一项全书“通例”都影响到书籍的完成情况，这给范文澜“总其成”的工作带来较大压力，不客气地说，统稿基本相当于重写一遍。

1941年，这部名为《中国通史简编》的教材终于按期完成。在当时，这本书为解放区官兵了解、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一部很好的教材，毛泽东当时对这本教材也给予了高度评价：“我们共产党人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不仅有我们的看法，而且写出了一部系统的完整的中国通史。这表明我们中国共产党对于自己国家几千年的历史有了发言权，也写出了科学的著作了。”1949年，华北人民政府教育部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以《中国通史简编》为底本，由叶蟠生、宋云彬对其进行删订，准备作为高中历史教材使用。

不过，范文澜本人对《中国通史简编》并不满意，时时想着修订工作，但在延安时期事务繁忙，他没有时间和机会进行这项工作。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修订《中国通史简编》一事终于提上议事日程。

怎样写好中国历史?范文澜自己曾总结了三点：一是指导思想，二是历史知识，三是充裕的时间。其中，一和三都是为二服务的。单说第二点，必须有扎实的历史知识，这包括

要了解、熟悉民族史、自然科学史、艺术史、哲学史等，要准确掌握历朝历代的人物、地名、典章制度、诏令奏议、公牍档案、职官制度、殉葬制度等，还有中国历史上浩如烟海的古代史籍……范文澜极其谦虚地说，自己掌握的历史知识很差，所以他一直努力去修订这本通史，以使其更臻完美。1953年，范文澜终于完成了这项工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于是年8月由人民出版社出版。

回顾历史，没有哪一部书像《中国通史简编》一样，不仅使用者众，就连对修订本的讨论、争鸣也甚为热闹。修订本问世后的一两年时间内，受到业界广泛关注。1954年4月，《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座谈会召开，会议记录刊登在1954年第2期《历史研究》上，在这一年第6期《历史研究》上，还集中刊发了赵光贤的《谈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王玉哲的《关于范著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册的几点意见》和吴大琨的《与范文澜同志讨论划分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标准问题》。1955年第1期《历史研究》刊发了署名“中山大学历史系”的《对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的意见》一文，1955年第3期《教学与研究》刊发了王忍之(中国历史教研室三年级研究生)的《对“中国通史简编”的几点意见》一文。这些批评、商榷文章所提意见，有关于古代传说的处理，原始公社的文化、历史分期的过程等不同意见。这些文章是当时热烈讨论《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的真实反映。

对《中国通史简编》提出的若干意见，范文澜持有十分谦虚的态度，同时进行着自我批评，在《中国通史简编》再版序言中，他写道：“在延安编辑的时候，因为材料缺乏，人力薄弱，仅仅一年半的日期，仓促脱稿，自然产生许多缺点，距离实际可用的通史，还有十万八千里。”

面对一些学术方面的争论，范文澜很少正面回应，但他从编写《中国通史简编》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范文澜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文章，一方面阐述自己关于历史学术问题、编写中国通史的思考，一方面也可以说是对一些质疑的回应。这些文章多为范文澜的学术思考，也基本勾勒出范文澜学术思考的发展脉络。

《中国通史简编》一书体现了范文

澜的写作风格——言简意赅，用词精美。这部书将中国历史梳理得十分清楚，不但讲清了帝王将相在历史长河中所起到的作用，而且还把人民推到历史舞台的中央，充分体现出“历史是人民的历史”这一编写理念。正因为此，《中国通史简编》被誉为我国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观点为指导编写的中国历史著作。

担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员

1958年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成立，作为19位古籍小组成员之一的范文澜，积极参与到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中，做了不少具体工作。2月9日至11日，古籍小组成立大会在全国政协礼堂召开，范文澜与其他小组成员及古书整理方面的专家学者、出版界代表近百人参加了大会。

1958年，中华书局制订1959年的出版选题计划和出书计划，时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办公室主任、中华书局总经理的金灿然给近代史所的刘大年写过一封信，希望近代史所与中华书局能够密切配合，并将近代史所的规划寄给中华书局，从而列入出版选题计划，而当时近代史所的所长即范文澜。

到了1960年11月，金灿然致函古籍小组组长齐燕铭，随信一并寄去古籍整理出版座谈会的初步名单，这份与会人员名单共有54人，其中20人为古籍规划小组成员。中国科学院近代史所拟参会的人员为范文澜、刘大年、刘桂五(学术秘书)；历史所有尹达、侯外庐、邓家驹等；文学所有何其芳、吴晗、曹大家、周、周一良、邵伯瑾、冯友兰、任继愈、魏建功等人，其他参会人员有国务院副秘书长齐燕铭、教育部副部长叶圣陶、北京市副市长吴晗等古籍小组成员。范文澜名字前面有△和√，金灿然在信中专门注明，有△者为古籍小组成员，共计20人，有√者为党员，共计44人。而范文澜是以党员、古籍小组成员及双重身份被列入参会名单的。

1961年3月，中华书局拟修订古汉语、古代及近代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著作、中华书局编辑必读书目等方面的若干个古籍整理规划，其中“整理出版中国近代史科长远规划草案”也在计划之中，近代史科长远规划草案的制订，再次得到范文澜的大力支持。

(作者系中华书局编辑)



姚雪垠倡导务实

周二中

某一年，老作家姚雪垠受邀到北岳恒山一带游览，当时他已经80岁了，陪同人员怕老人家走不动，想扶他一把，但姚老步履稳健，硬是不需要搀扶，一口气登上了悬空寺。

姚雪垠是文化名人，当地自然不想放过这个机会，想请他留下墨宝。悬空寺方面已经准备好了文房四宝，请姚老题词。姚雪垠触景生情，当然也是想到自己的人生经历，于是挥笔写下了八个苍劲有力的大字：寺惊悬空，事贵落实。

其实，姚雪垠也是有感而发的。姚雪垠先生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一个人要成就一番事业，就必须坚忍不拔，克服困难，珍惜时间，下苦功夫。这几句普通的话，说起来容易，真正做到还不容易呢!我1957年被打成‘极右派’之后，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开始创作《李自成》。不管是身处逆境之时，还是条件有了改善以后，我总是激励自己：抓紧时间，克服困难，

写下去!写下去!每天凌晨两点半就起床写作，几十年已经形成习惯，每一天都不敢稍有懈怠，这似乎也成了我的使命感和责任感。”他这一番概括自己创作经历的话其实就是对“事贵落实”的最好诠释。

当年，姚雪垠写长篇小说《李自成》第五部的时候，已经80多岁了。那个时候，他握笔写字都已经很困难了，于是，他只好通过口述的方式来写作。有一次，姚雪垠对已经成稿的30多万字很不满意，认为不能打动自己，于是毅然用红铅笔在稿子上写上“作废”二字，又推倒重来。姚雪垠先生一直坚持以务实的精神来写小说，绝不对自己放松要求。姚雪垠还说过这样的话：耐得住寂寞，才能不寂寞；耐不得寂寞，偏偏寂寞。耐不得寂寞的人，就会心浮气躁，哗众取宠，热衷于赶时髦、出风头。这样的人，不可能刻苦努力，更谈不上埋头钻研，就不可能取得大的成绩，当然也难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

也正因为如此，他后来才著就300余万言的超长篇小说《李自成》。



于非闇在老舍家中写生

郑学富

于非闇被称为20世纪北方“京派”工笔花鸟画的杰出代表，他极重写生，每逢公园牡丹盛开，或闻某处有菊花展览，他必去观赏，时刻留神观察百卉虫鸟，勾画底稿多幅，以求精确。特别是老舍所住的四合院，成为于非闇经常光顾的场所，赏菊写生。老舍在《悼于非闇画师》一文中说：“每值我家菊开，画师必来，徘徊花间，见花瓣如针，或色微韵秀，频谓‘这怎么画呢?怎么画呢?’事实上，他并不畏难，他千方百计地想办法，把最不易摹拟的画了出来。”

于非闇年长老舍10岁，二人都出生于京城旗人家庭。新中国成立后，二人都工作、生活在北京，一个是画坛巨匠，一个是文坛大师，可谓是文友至交。老舍的夫人胡淑青还曾拜于非闇为师，学习绘画。1950年老舍由美国归国后，自己花钱购买了一座普通的四合小院。此院位于北京市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老舍在此居住16年，一直到逝世。他在此创作了《茶馆》等20余部剧作。老舍在四合院里栽有很多菊花，特别是门前的两棵柿子树，

每当深秋时节，红彤彤的柿子挂满枝头，老舍夫人称之为“丹柿小院”。

1958年深秋，老舍邀请于非闇等若干文友到小院赏菊雅集，议论论坛之事。在观看菊花时，老舍庭院中的柿子树硕果累累，深深吸引了于非闇，他画兴陡起，拿起画笔创作了一幅工笔花鸟画《丹柿图》。

画面上若干柿树枝由左上角斜插而来，枝上的丹柿红的彤彤，黄的泛金，果蒂翠绿，挂满了枝头，摇摇欲坠；枝上树叶茂密，有的平铺，有的翻卷，有的残缺不全，说明作者观察生活之细腻，那是被虫子咬损了边缘。叶子的细处也颇具匠心，叶子的正面是深褐色的，背面是浅紫紫色的，叶脉纹路清晰可见。两只翠鸟形态生动，一上一下，相互呼应，栩栩如生。构图打破陈规，用笔刚柔相济，着色艳丽而不俗。尽管果实压弯了树枝，但是树枝仍倔强地成弧形向上翘起，呈现出积极向上的勃勃生机。此画表现的意蕴犹如黄庭坚“柿叶铺庭红糝秋”之诗境。于非闇在画面左下用瘦金体落款“老舍家看菊花见丹柿满树图之 非闇七十岁”。



陈子展说“幽默”译名

杨建民

复旦大学有名教授陈子展，20世纪30年代在上海《申报》“自由谈”栏目，发表了一批有质量的杂文。其时，鲁迅、茅盾等文化名人均是此栏目的“大牌”“支柱”。

1933年2月，陈子展写出一篇数百字的《论幽默译名》，发表在“自由谈”，对“幽默”一词的翻译情形，给予描述。他认为：英语Humour翻译为“幽默”，始于作家林语堂。林语堂编辑《论语》半月刊时，就希望来稿者以“幽默”的态度作文。当时，这一译名并未得到人们的一致认可。以翻译法国文学，尤其翻译莫泊桑为主的李青崖，就认为“幽默”不如翻成“语妙”来搞“兼顾音义二者”。语言学家陈望道则认为可以用“油腔滑调”中的“油滑”来翻译。在陈子展看来，“油滑”二字，陈望道“言者正色”(正经)，而“闻者失笑”。大约觉得大老用这么“俗”的字眼，有些可笑。

学者讨论外，也有通外语者出来发言。有人说：俄文相当于幽默的词，从译音听来，可为“狗不咬”。陈子展觉得此译名“直欲令人喷饭”。他读了当时人们所写的“幽默”文章，觉着“皆以微嘲暗语为能事”，所以认为可以用“优骂”替代幽默。他在刊物上读到《孤桐杂记》(“孤桐”，即章士钊)，文章对人们误解“幽默”一词不以为然。在章士钊看来，这个词的英文原意：“指善为俊语者之风趣也，而字面做得其反，易生歧解。”在他看来，“音译”是名词翻译的“良法”。因为用汉字翻译，字的文意便会参与进去，造成更大误会。倘“偶一不慎，恐将与冰麒麟等词同一丑恶。”“冰麒麟”是今天大家熟悉的“冰激凌”，当年用“冰”加神善“麒麟”翻译，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章士钊甚至认为“丑恶”。“虽幽默二字弊不至此，频频误用，即大不佳”，所以他建议，用较生僻且不易产生误会而同音“西靴”改换“幽默”会不会好些?可惜，章士钊当时的提议，并未引发大家重视，更不用说认可了。

我国翻译大家严复曾有言：“一名之立，旬月踟蹰。”一个合适的译名确定，要花费十数天一月工夫，数位大家耗费时日探讨“幽默”译名，可为一证。



林海音捐书

崔鹤同

1990年5月17日晚，年已72岁的林海音回到了阔别近42年的北京。数日后，离开北京的前一天，她由萧乾、文洁若等人陪同，参观了现代文学馆，由当时的馆长杨犁、副馆长舒乙接待。

那天她站在文学馆的图书书架前，仔细地数了数台湾的文学书，一边数一边摇头说：“不全，不全，太不全。”她说，她回到台湾，要寄一套“纯文学”的书来送给文学馆。果不其然，一个多月后，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了林海音寄来的四大箱赠书，一共202本，“纯文学”的书一本也没少。后来她又寄来了早已绝版的全套《纯文学月刊》。《纯文学月刊》1967年1月由林海音创办，她担任发行人及主编。她办了54期后于1971年6月将《纯文学月刊》交还学生书局，学生书局接办8期后于1972年2月停刊。林海音捐赠的这套《纯文学月刊》是中国大陆唯一的一套。这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馆收到的第一批数量多、质量高的台湾当代图书。

接着，林海音号召当时台湾文学出版界的九歌、洪范、尔雅、大地等著名出版社，也把整套的书赠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寄费完全由林海音出。这一大批书充实了台湾文库；大陆的研究生、作家、出版社要看台湾的作品，要编字典，都向现代文学馆借。这些藏书，引起了大陆出版社高度关注。后来，其他的台湾出版社听说也也纷纷捐书。

尔后，舒乙又产生了汇编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作品向大陆的读者介绍的想法。于是就编辑名为《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由中国现代文学馆主编。文学馆还聘请了冰心、萧乾、林海音三位担任顾问，第一辑选出了白先勇、余光中、林文月、林海音、徐钟、彭歌、张秀亚、琦君、黄春明、郑清文等十位作家的代表作，1993年11月，由长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林海音带头捐书和《台湾当代著名作家代表作大系》第一辑十卷的出版，加强了海峡两岸作家的交往和文化交流，具有重大的意义。

李大钊在开封

李军涛 石海利

在河南大学明伦校区的六号楼前，矗立着一座李大钊的雕像，雕像底座上两段说明文字：“李大钊——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先驱，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5年7月，李大钊为国民二军的统战工作来汴，在此楼的教室里为我校师生作了关于帝国主义侵略罪行的演讲。”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开封之旅不仅掀开了河南大学革命运动史上光辉灿烂的一页，更推动了大革命时期河南革命运动的广泛发展。

1925年1月初，李大钊在屈武的陪同下，第一次来开封。正值倾向革命、胸襟开阔兼收并容各方人士的胡景翼率国民二军进驻开封，并任河

南督办。李大钊曾说过，“把胡景翼培养起来，这将来同我党合作是个可靠的人，这个力量培养起来，对我们党的事业是有利的。”他与胡景翼进行了多次会谈，并帮助胡景翼制定治豫方案，解决了从苏联运来的军事武器在国民军中如何分配的问题；派苏联专家、顾问等有关问题；有关政治上组织上的重大问题等。李大钊回到北京后，即根据胡景翼的要求及整个河南情况，先后派往河南大批优秀共产党员、苏联顾问，充实加强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条战线，同时根据河南各级党的建设发展情况，工人运动、学生运动等情况，派来了得力干部。李大钊所做的这些工作，使得当时整个河南各方面工作都显示出蒸蒸日上的大好局面。

李大钊第二次来开封，是在河南形势发生巨大变化的重要时刻。1925年4月10日，胡景翼患痔疮不治身亡，统治河南的大权旁落到思想落后守旧的岳西峰之手。岳西峰背离胡景翼在世时的做法，疏远开明的国民党元老，不支持甚至反对共产党的工作，导致河南局势急剧直下。

1925年7月，李大钊带着国民二军素有渊源的于右任再次来到开封，力图挽回危局。李大钊向岳西峰宣传中共的革命主张和对时局看法，希望他能像胡景翼一样继续支持河南工农、青年学生的革命运动，巩固统一战线。除此之外，李大钊还出席了开封各学校及民众团体为他举办的欢迎大会，并发表讲话。此时正值“五卅惨案”发生后不久，全国各地的

反帝爱国运动此起彼伏。李大钊为了让河南人民认清英、日帝国主义真面目，顶着酷暑在当时中州大学六号楼三楼图书馆的小礼堂为学校师生及开封军民作了“大英帝国主义侵华史”的主题演讲。

该演讲刊于1925年8月开封第一师范学校学生社创办的《雷火》第8期上，是河南仅存的李大钊珍贵的文献之一。李大钊先从“帝国主义如何进入中国”讲起，并罗列了英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对于“太平天国”“义和团”“辛亥革命”进行了高度的赞扬，同时号召国民参加革命运动，认为“中国人民要想翻身非全党觉醒不可”，提出了“尊重民权、打倒军阀、打倒帝国主义”三条运动口号，并希望“中国的青年诸位，全都起来，参加现在之国民革命运动，使之早日实现。”

嵩岳苍苍，河水泱泱。登上六号楼三楼，仿佛回到了1925年那个暑假，李大钊的演讲迸发出穿透人心的力量，开封爱国青年和军民满腔热情的呐喊声穿越时空……

(作者单位：开封市委统战部)